

# 四十感懷

重刊（原載本誌第二八四期）

●馬英九（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台北市市長）

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參加一個青年節慶祝會，會中被問到年齡，才驚覺這是我青年時代的最後一個青年節了！因為照「十大傑出青年」的選拔標準，四十歲是青年期的上限。

告別青年時代，固然有近「關」情怯的悵然，但也不無減輕年齡（太輕）壓力、邁向成熟的喜悅。此外，我迄今「視」既不茫茫，「髮」亦未蒼蒼，齒牙更固若磐石，每天在平均十三小時工作量的壓力下，仍維持晨跑（數公里）與晚操（伏地挺身六十次），較諸十八年前在海軍陸戰隊受訓時的體能狀況，亦不遑多讓。顯然，至少在生理上，毫無 *old-time citizen* 的跡象。

真正令人感慨良多的，還是這四十年台灣的變化。我出生的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是中華民國政府轉危為安的一年。前一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在北平成立，十二月七日中央政府自成都遷台；三十九年元月，英國率先承認中共，西、北歐國家紛紛跟進。而中共又隔海叫囂「血洗台灣」，一時之間，台灣危如累卵，一夕數驚。三月初，先總統蔣公介石復行視事，大局初定。六月二十五日，北韓南侵，韓戰爆發。兩天後，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巡邏台海，並聲稱「台灣未來地位猶待決定」，為往後長遠二十二年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埋下伏筆。七月間，中國國民黨決定進行黨的改造，全面檢討失去大陸的原因，也在七月間，台灣省花蓮縣舉行全台第一次縣議員選舉，為台灣的地方自治邁出了歷史的一步，也為往後台灣四十年的民主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蔣公在當時那種風雨飄搖的局面下，猶能辦理並非「當務之急」的地方選舉，其魄力與遠見確非常人能及。而與有榮焉的是，我就出生在這個值得紀念的七月——韓戰爆發的十八天後。

韓戰把美、蘇對抗帶到亞洲，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因而暫時解除，我們這些「生於憂患」的幼苗，就在百廢待舉的台灣開始成長、茁壯，一轉眼四十年過去了。通常歷史家數太平盛世，總是舉西漢的文景之治與盛唐的貞觀之治；前者合計三十九年，後者不過二十三年。而這四十年來，台灣兼有和平、安定、繁榮與開放，在戰亂頻仍的近代中國固然絕無僅有，即令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亦不多見。

隨著台灣成長的我們這一代，童年時期雖然沒有電視、麥當勞與小虎隊，但我們卻有挖蚯蚓、打彈珠與看「諸葛四郎大戰魔鬼黨」的樂趣。四十年來，我們眼看著機車取代腳踏車、小汽車取代機車、進口車取代國產車；也看著馬路一天天變得寸步難行。我們深深地體會到：成長固然可欲，但「成長」不一定等於「進步」，如果成長是不均衡的話。

我們的文化建設與環境保護並未隨著財富的累積而同步成長，但是大家畢竟都變得富裕了。進大學後，我們在不愁衣食之餘，開始思考本身的社會責任。所以，當美國要把釣魚台列嶼隨琉球「交還」日本時，我們就憤怒地走上街頭，指責「日本無理，美國荒謬」；當我們發現雲林縣山西鄉的農民每天收入只有六元新台幣時，我們開始籌組「社會服務團」，要作「百萬小時的奉獻」。而當其他的大學生在忙於檢討別人的時候，我也曾算過：一個公立大學的學生，每晚一堂課，國家就要浪費新台幣十七元左右，幾乎是雲林農民每天收入的三倍！（當時牛肉水餃一個五角，一菜一湯的客飯只要八元）。

當時這些自認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吃台灣人民種的米長大，卻抱著「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心態，多數在畢業後負笈太平洋彼岸，其中又有不少一去不返。這就是對台灣母社會的回報嗎？當我在美國留學時，這類問題也時時縈繞心頭。所以當我們聽到一位院士級的左派教授，在看完大陸製作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宣傳短片後，大言不慚地說要回大陸去「為人民服務」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問：當他偶爾返台作蜻蜓點水似的講學時，可曾出現過「一定要把淡水河治好」的念頭？同樣的，當我們聽到少數獨派人士要以城市游擊戰來反抗「外來政權統治」時，我們也不禁要問：台灣需要這些脫離現實的「建國領袖」嗎？

在批評別人的同時，我們也進行深刻的反思——我們不可言行不一，雙重標準，在學成之時，我們乃用腳來明志——回到了生長的地方。我們要讓大家都告訴大家：我們不介意放棄高薪，回台灣住鴿子籠、擠公車，因為只有為自己的鄉土服務，才有千金不易的歸屬感。我們既不是「無根的一代」，也不是「失落的一代」，我們應該是「感恩的一代」與「反哺的一代」。因為我們的上一代在連年的兵燹與窮困中獻出了他們的青春乃至生命，才換得我們享有中國歷史上僅見的承平與繁榮。我們受到最週全的呵護、最完整的教育。當我們已經成長茁壯的此刻，能不義無反顧地回饋台灣母社會嗎？

對我而言，反饋意味著政治改革、經濟轉型、社會重建與文化復興。在落實民主憲政、促進產業升級的同時，還要尋回失去的人文價值，進而整合與光大我們的文化理想，庶幾乎台灣不再被國際媒體蔑稱為「貪婪之島」(Island of Greed)，而應是「優雅之島」(Island of Gracefulness)，中華民國不再被諷稱為「賭場之國」(Republic of Casino)，而應是「文化之國」(Republic of Culture)。

我是一個不重視生日的人，從不記得家人的生日，婚前基於現實需要，才努力記住太太的生日。邁入不惑之年當天，我正在美國加州參加「浩然研習營」，當天下午由我報告「台灣的政治改革」，由盧修一與劉興善兩位立委講評，對象三分之二是大陸旅外學人、留學生，三分之一是台灣學人。這個報告，給我機會回顧我們一起走過的四十年，希望在未來的歲月中，台灣能加速改革步伐，追求均衡成長，真正把「成長」與「進步」劃上等號，也希望大陸能擺脫貧窮、落後與專制，走向民主、均富與多元化。「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是我們聽了（也喊了）許多年的口號，在二十一世紀只有十年即將到來的此刻，我們這一代斷不可向歷史繳白卷！（選自中國時報人間副刊）